



香港電影 第一案

李以庄 周承人 著

廣東省出版集團
花城出版社

香港电影 第一案

李以庄 周承人 著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香港电影第一案 / 李以庄, 周承人著.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2.8

ISBN 978-7-5360-6520-8

I. ①香… II. ①李… ②周… III. ①电影史—香港
—文集 IV. ①J909.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69498号

出 版 人: 詹秀敏
责任编辑: 文 珍 杜小烨
特约编辑: 画外音
技术编辑: 薛伟民 凌春梅
装帧设计: 书 美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 23 号)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32 开
印 张 7.625 1 插页
字 数 190,000 字
版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目 录

001	自序 治史一得
-----	---------

一、“百年论辩”与史观

011	“香港电影百年”论辩
027	史观与治史
041	在庄重评选的背后……

二、黎民伟的不实光环

047	黎民伟的若干经历和评价 ——勘误与质疑
068	事实是一切评价的基础 ——对黎民伟若干史实与评价的再勘误
086	满纸荒唐言 ——评专题片《黎民伟：中国电影之父》

三、重要史实考证

095	历史纪录片《勋业千秋》考
120	上海联华影业公司体制和组织

四、被屏蔽的黎北海

141	香港电影先驱黎北海
150	省港大罢工与香港影业重建 ——黎北海和他的学生们
169	早期香港电影业中的黎北海、黎民伟

五、历史的致敬

- 183 香港首次纪念黎北海的公众活动
——黎北海逝世50周年纪念座谈会摘要

208 后记

附录：诸家评说

- 213 黎民伟被称为“中国电影之父”的争议
——大部分中国电影史的开头可能要改写
台湾资深影评人 黄仁
- 220 从电影史看兄弟班
香港国际电影节艺术总监、资深影评人 李焯桃
- 224 偏于“完美化”表扬伟人
——续谈《香港电影第一Take——黎民伟，开麦拉》
香港资深影评人 石琪
- 226 孙中山为黎民伟题“天下为公”考
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 余齐昭
- 232 我所知道的四年争议
香港《电影双周刊》原总编辑 陈柏生
- 237 反方观点文章目录

治史一得

粤人史学大家梁启超（1873-1929）曰：“史者何？记述人类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活动之体相：人类为生存而活动，亦为活动而生存。……凡活动，以能活动者为体，以所活动者为相。史也者，综合彼参与活动之种种体与其活动所表现之种种相，而成一有结构的叙述者也。”^{〔1〕}

亦为粤人史学家张荫麟（1905-1942）说得简明：“历史之探索，乃根据过去人类活动在现今之遗迹，以重构过去人类活动之真相。无证据之历史观直是谗吃而已。”^{〔2〕}

当我们尚未能以独立研究身份进入黎民伟历史活动范畴时，亦曾循人云之云，且深信不疑。明清之际思想家、史学家黄宗羲（1610-1695）曾言：“大疑则大悟，小疑则小悟，不疑则不悟。”当我们不疑时，以伪为真，历久不悟。

但当读到人云黎民伟在香港办过“演员养成所”，著名导演李铁乃其学生！我们顿生疑团。查对确凿史实，证实为其四兄黎北海在港开山之功，亦为李铁之恩师。非黎民伟之所为！乃对人云其种种“伟大”、多多“勋业”产生大疑。又经历年，将其自诩与确凿史料、相关史实及史界考证比对，方得释疑解惑，判定是非正误，确立自己的认知。

从而，我们深刻体会到：对任何史料，即使是当事人、其亲属及后人之说，亦应与相关的确凿可靠史料相比对，确凿认



定其正、误后，方能决定是否可作为史实依据。不能因“当事人、其亲属及后人”，或具某某“权威”的“特殊身份”而轻信。

我们研究香港影史近30年，在研究、考证中，发现黎民伟自诩中亦存有不实之说、之事，尤在涉及孙中山之史事上最甚。限于篇幅，仅列下述三例：

一、黎民伟声称拍摄了“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纪录片”。

黎民伟在《失败者之言——中国电影摇篮时代之保姆》一文中，言之凿凿地说：“注意摄制新闻纪录片，举凡孙中山先生之行动，如就任临时大总统职”。

历史事实是：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成功后，12月25日，孙中山方归国，被举为临时大总统，于1912年1月1日，在南京宣誓就职。

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典礼的时间在1912年1月1日深夜。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的余齐昭考证说：“当时摄影技术尚不能在夜间摄影，因此中华民国开国大典没有留下一幅照片，成为历史遗憾，更不用说拍活动纪录片了。”^[3]1912年1月3日上海《民立报》报导：“夜十一时，于总统府举行就职典礼”，证实余齐昭之说。

2005年12月，拙著《早期香港影史》繁体字本在香港由三联书店出版时，即在书中指出此纪录片根本不存在的事实。并补充：黎民伟出生于1893年，1911年在港加入中国同盟会，对电影摄影还完全是个门外汉，不可能在1912年就拍摄纪录片^[4]。

对此揭露，其后人黎锡，在2006年11月于香港《电影双周刊》第720期发表《对黎民伟与黎北海的评价——与周承人、李以庄商榷》，借余慕云之口，毫无根据地说：“黎民伟把‘非常大总统’错写为‘临时大总统’，这是非常明显的错

写”。妄加否定。

但对于这部不存在的“纪录片”，黎民伟不仅在文章中自诩“摄制”了，当年还对人说过。他对当年上海“民新”的编导欧阳予倩就曾自诩过。欧阳予倩当然不可能看过这部不存在的“纪录片”，但黎民伟的自诩，确给欧阳予倩留下深刻印象，以至在30多年后的1962年，欧阳予倩在其回忆录《电影半路出家记》中写着：“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的纪录片就是他拍的，他很引为光荣。这部纪录片也就成了他在政治方面、艺术方面的资本。”

欧阳予倩的记述，即可确证黎锡为其父辩解之“错写”说，是徒劳的！

问题在于：这篇写有根本不存在的“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纪录片”之事的黎民伟“自述文”，在我们考证之前，黎锡曾经发表了三次，他都没有提出“错写”之说，而加以纠正或删除。为何在我们予以揭露后，黎锡就忙不迭地说是其父“错写”，为之掩饰？！

更严重的问题还在于：黎锡不仅妄说其父“错写”，还为了填补其父此处“空白”，又另行编造一个“历史功绩”，说：黎民伟是“拍摄了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记录片”！但提不出任何确凿历史证据为凭！

孙中山先生就任非常大总统的历史真相是：“1921年4月广州非常国会通过了《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决定成立正式政府，并且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于5月5日就职。”^[5]

1921年5月12、13日上海《民国日报》报导，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有很隆重的仪式：上午八时在总统府受证书、九时半在国会宣誓、九时四十分摄影（集体合影照片——笔者）、十时在北较场阅兵、十一时在总统府受贺（各机关职员及来宾）、十二时在财厅受贺（市民）并观各界游行，同时宴请中外士女千二百余人，十二时半各大巡游队伍鱼贯而来，



至三时半全队过毕。

余慕云生前在《香港电影掌故》第48页中清楚记述：“1921年7月31日，香港和平戏院公映一部新闻纪录片，名字叫做《孙总统授任广州庆典》。这是近代伟人孙中山先生的第一部新闻纪录片……第二部孙中山先生的新闻纪录片，《孙总统就职及祭黄花岗》，则在同年（1921）8月20日，在香港比照电影院公映。以上两部孙中山的珍贵新闻纪录片，都是外国摄影师拍摄的。估计是法国百代公司出品的。”

经我们查证：1921年5月13日上海《民国日报》报导：“该会（指就职典礼大会——笔者）是日并聘请世界著名影画片制造百代公司摄影师赛门君，在财政厅前摄取各种游行之真像，制成影画片。”

历史事实证明：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的纪录片拍摄者，是法国百代公司摄影师赛门先生，并非黎民伟所为。

黎民伟在1921年5月3日的《日记》中记有：“夜船上省。”5月5日：“孙中山先生就总统职于粤。”5月7日：“予与郑岳母及外公晚车返港。”他从5月4日到7日在广州逗留三天。日记中未记有“摄电影”字样。若他真要拍摄纪录片，一定带助手！值得注意的是，1921年距其成立民新制造影画片公司早两年，黎民伟尚无拍摄电影的器材！

1922年阴历二月八日（阳历3月6日）《黎民伟日记》所记：黎民伟在当日还只能用普通照相机拍香港海员罢工胜利的场面。他说：“予拍呆照！”

一年之后，即民新制造影画片公司前五个月的1923年2月，黎民伟在17日的《日记》中才记有：“早孙中山先生到港，伟与彭年（留学美国的摄影师——笔者）往接应，并摄电影。”此为他们首次拍摄孙中山纪录片，掌机者当是摄影师彭年。怎能凭空推前两年，竟在1921年5月他就有电影摄影机，并由他自己拍摄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纪录片？！

二、黎民伟1929年第二次发表孙中山的题字“天下为公”时声称：“追随总理左右，由粤之韶关，北进沿途，总理誓师、行军动作，曾一一摄得。是时，总理曾以‘天下为公’四字相助。及后，总理应段祺瑞之请，北上救国，逝世于平之协和医院，伟亦相随摄影。……”（见下图）

天下為公

民偉先生

孫文

□ 用墓陵理總刻選府政央中為已寶墨此按 □

民十三省總民新影片公司成立
之初偉以總理北伐事蹟攝
為電影放映總向中外人士盡
量宣傳藉資揚總理偉大之精
神顯明總理革命之意義因此
追隨總理左右由粵北進沿途
一一攝得是時總理曾以天下
為公四字相助及後總理應段
祺瑞之請北上救國逝世於平
協和醫院偉亦相隨攝影總理
逝後偉更冀願將總理一生
畫力尚未成功之革命事業繼
續攝影因是選派攝影人員分途
向國民革命軍各及軍及敵軍陣
地實地攝取戰景國民革命今
始慶成功革命軍海陸空大取
一片亦告一段落偉既壯感慨
繫之檢拾片匣得總理遺澤特
敬附本刊以誌不忘

黎民偉 廿九年三月廿六日

▲（上海《电影月报》1929年第9期第3页）

历史上真有“伟亦相随摄影”其事吗？

史实是：孙中山自1924年11月北上，直至1925年3月12日去世的整段时间内，黎民伟一直身在广州和香港，并不在北京。

且看《黎民伟日记》的记载：

1924年“11月28日早，到西关（广州），摄影《情场法网》，即《胭脂》。民伟与楚楚为剧中主角”。而直到1925年1月21日，《胭脂》才拍完。^[6]

同页又记载：《胭脂》于1925年“2月23日在港新世界戏



院公演”。“5月4日，‘民新’解散”。“民新”是黎氏三兄弟合办的电影公司、《胭脂》是其公司创业作，“民新”解散。涉及公司资产分割，事关黎民伟切身大事，他不可能离开香港。

孙中山在1925年3月12日逝世于北京时，《黎民伟日记》第12页又清晰记载：“1925年3月17日，广州市开追悼会，伟往摄电影。”

在此段历史中，黎民伟难道有分身之术“相随孙中山”？

孙中山逝世于北京铁狮子胡同行辕，而非协和医院！先生逝后方送协和医院作防腐手术，故出殡由协和医院出。黎民伟连孙中山在什么地方逝世，都不清楚。竟声称：“伟亦相随摄影！”与事实并不相符。

三、黎民伟晚年写《失败者之言——中国电影摇篮时代之褓姆》中说，“由我与罗永祥、彭年等随军摄制”新闻纪录片，其中有“攻打惠州城”一役。^[7]历史真是这样吗？

据《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记载：攻打惠州城之前，孙中山由1923年6月7日至6月12日，四次亲自临惠州城前线督师：

6月7日赴惠州前线视察。（该书1640页）

6月8日，督师攻打惠州城。（同上页）

6月9日，发动第二次攻击惠州城。（该书1641页）

6月12日，偕许崇智、蒋介石及各要人，再赴惠州前线。（1642页）⁽⁸⁾

而《黎民伟日记》第11页记载：“1923年4月10日与父亲、贞、意乘加兰总统往日本看远东第六届运动会。”其行程如下：

4月10日（阳历），由香港乘加兰总统号邮轮到上海，再转乘邮轮赴日本。

三月廿七日（即阳历5月12日）早到上海。即由港抵沪

历时32天。

三月廿八日（即阳历5月13日）早（由上海）启行（赴日本）。

三月三十早七时（即阳历5月15日）抵神户。日领事及留日学生来欢迎。

四月一日（即阳历5月16日）早十时赴中华会馆欢迎会，二时乘车往大阪，乘汽车游竞技场。

四月七日，（即阳历5月22日）在运动场欲影足球赛被阻，晚车赴东京。

四月十日（即阳历5月25日）赴横滨。

四月十三日（即阳历5月28日）回神户。

四月十四日（即阳历5月29日）往大阪。

四月十五日（即阳历5月30日）抵长崎。

四月十八日（即阳历6月2日）抵沪。

五月一日，（即阳历6月14日）晚返申，与美记者拍电影。

值得注意的是：黎民伟偕两妻及其父，自4月10日起，自香港乘邮轮赴上海。5月13日由上海赴日本旅游。直至6月2日方回到沪上。然后，于“6月14日晚返申，与美记者拍电影”。从6月2日到6月14日晚，前后共十二天时间，《日记》缺失。以当年沪、港与粤东惠州间的交通条件，在前后十二天时间内，不可能往返三地！黎民伟当然不可能出现在惠州前线！

再据《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记载：“6月13日，（孙）致电大本营，飭将新制飞机二驾飞赴东江前线。”^[9]即是说，飞机出现在攻打惠州城前线的时间，是在6月13日之后，黎民伟其时身在上海，正“与美记者拍电影”。直接否定了黎锡所说“惠州战役时，黎民伟还尝试了空中拍摄”之言。

据此可确证：黎民伟完全不可能出现在“攻打惠州城”的现场。他所说“我与罗永祥、彭年等随军摄制”新闻纪录片，其中有“攻打惠州城”一役之事，乃至黎锡所说“黎民伟



还尝试了空中拍摄”；“在小型双翼飞机上，他把飞机底部舱门打开，将自己和摄影机牢牢绑在飞机上，俯拍整个战场，难度和危险性极大。”^[10]种种皆无稽之谈。

至于历史纪录片《勛业千秋》中的航拍镜头出于何人之手？需另作考证。

上述三例说明：历史是不以人们意志而改变之独自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我们只能依据确凿的历史事实，去构建信史。

史学，是要经得起历史考验的诚信之学。是为序。

2012年4月

注释：

[1]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方法》第一章，石家庄市：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6页。

[2]余世存编：《非常道——1840-1999的中国话语》，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145页。

[3]余齐昭：《孙中山文史图片考释（修订版）》，广州：广东省出版集团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2009年12月，196页。

[4]周承人、李以庄：《早期香港影史》繁体字本，香港：三联书店出版，2005年12月，41-42页。

[5]张宪文等主编：《中华民国大词典》，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1162页。

[6]黎民伟：《黎民伟日记》，香港：香港电影资料馆出版，2003年，第12页。

[7]黎锡、罗卡编著：《黎民伟：人·时代·电影》，香港：明窗出版社，1999年，170页。

[8]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8月出版，1640—1642页。

[9]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8月出版，1642页。《申报》1923年6月15日，亦有报导。

[10]2011年10月8日《广州日报》。

一、“百年论辩”与史观

“香港电影百年”论辩

2009年是香港电影界重要历史时刻：一月中旬，香港电影总会会长吴思远主持的系列专题片《香港电影百年光影》，在北京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探索与发现”栏目连续播映；吴思远亲自出镜，肯定“今年是香港电影百年”；香港贸易发展局与香港电影商会和中国电影海外推广公司合作于5月16日在法国戛纳举行酒会，庆祝香港电影百年；此活动更得到中国国家广电总局及香港电影发展局出席支持。一系列公众活动，在承认历史、尊重历史的基础上，肯定1909年摄制的首部华人导演、美国人监制的《偷烧鸭》，为香港电影百年纪元的标志物。

电影与文化身份

在世界范围内，除初始发明电影的国家外，其他国家与地区都有电影何时传入，和本土人士何时参与电影制作的问题，中国/香港也不例外。作为工业革命后的现代文明（文化）标志之一的电影，它的被接受与本土人士参与制作，不仅标志该国家、地区接受与分享现代文明成果，还通过参与制作赋予这一舶来品以明确的文化身份，对多元世界文化作出贡献。这是人们为什么寻找本土“第一部”电影的原动力。“第一部”



电影的确立，标志着本土电影文化的诞生。现在香港影人寻找香港“第一部”电影的意义，即在于此。后来者需要知道自己的电影文化始于何时。

电影的发明与形成，是欧、美科学家们不断接力的过程，但使它成为一种商业行为，惠及大众，则是美国人爱迪生和法国人卢米埃兄弟。爱迪生发明只供一个人观看的“电影窥镜”，卢米埃则改进为放映（机器），供众人在银幕观看。当全世界在1995年庆祝电影诞生百年，以纪念卢米埃兄弟在1895年12月28日于巴黎商业放映成功之时，美国人却提前在1993年庆祝他们的电影诞生一百年——即纪念爱迪生1893年在芝加哥万国博览会推出“电影窥镜”。美国人有理由不承认电影是法国人发明的，更不愿让电影失去美国文化身份。

何以是百年

香港电影纪元始于何年？在2003年10月之前没有分歧，一致推崇所谓“香港电影之父黎民伟”在“1913年拍摄了《庄子试妻》”，为香港电影纪元之始。2003年10月，这种“一致”被打破，肇事者为我们。由此揭开由罗卡多年来“抬举”黎民伟为“中国/香港电影之父”神话的面纱，人们重新审视香港早期影史。随之，发生了罗卡、黎锡等与我们之间，围绕黎民伟有关史实与评价的论争。主要涉及：香港华美公司有无黎民伟股份？是否“合资”或“合办”的香港公司？《庄子试妻》是否香港第一部电影？能否说是黎民伟“拍摄”？黎民伟是否为中国/香港电影之父？黎民伟在联华影业公司的真实历史地位与作用？等等。论争的缘起是罗卡为“抬举”黎民伟，竟随意将并非黎民伟的事迹甚至功劳，自动转账到其名下。甚至无中生有说：黎民伟“培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词、曲作者田汉、聂耳！^[1]